

絲瓷之路上的世界名港——泉州

1991年2月(夏曆辛未年)春節期間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在中國福建省泉州市，舉行了“海上絲綢之路”或“馬可波羅航線”考察的國際學術討論會。為甚麼在中國沿海諸多港口中，泉州能獲此殊榮呢？原來泉州就是當年馬可波羅升舶西航返國的始發地，也是宋元之際世界著名的貿易大港。下面擬介紹泉州港的簡史，使人領略此古代名港昔日的丰采。

神州東南的天然良港

泉州位於福建省東南部，枕山面海，風光綺麗，素有“山川之美為東南之最”的佳評。相傳晉室衣冠南渡時，避居此地者多沿江而居，故稱流經此處的河流為晉江，爾後，晉江便成為泉州所在的縣名。因為氣候溫潤適宜，泉州亦稱溫陵；更兼由清源山俯瞰全城，其形似鯉魚，遂有鯉城之雅號。此外，泉州還以刺桐城而聞名，據《福建通志》所載：“刺桐城，節度使留從效重加版築，傍植刺桐，歲久繁密。”

自古迄今，猶如彩虹錦帶般的晉江穿過泉州，兩岸青山連綿，田園似錦，世世代代哺養了泉州人民，也孕育了泉州古代輝煌的文化。由於瀕臨浩瀚無際的東海，海岸線蜿蜒曲折，有深邃的水道與天然的良港，故一個中世紀世界名港即誕生於這般山明水秀之地。

閩越先民善於舟楫

泉州之所以在古代海外交通史上，佔居重要地位，同當地居民富有航海傳統密不可分。在上古時期，福建是七閩之地，為閩越人所聚居。越族向以善於造船、習於航海而著稱，“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利”。《淮南子》說“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”，《越絕書》也載其人“水

行而山處，以船為車，以楫為馬，往若飄風，去則難從”。

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，越人已能獻舟於天子，可見其造船技術臻於成熟；而且獻舟須由東海繞山東半島而入渤海，說明其航海水平之提高。

漢至六朝交通海外

秦漢以降，福建一帶已設郡置縣。泉州在秦時屬閩中郡，漢晉時先後屬冶縣、侯官縣、晉安縣（治今福州一帶）。西晉末年，中原板蕩，衣冠南渡而入閩者眾，使泉州地區得到空前的開發。當時新移民多沿晉江兩岸而居，並泛舟出海，交通國外，於是泉州港便逐漸嶄露頭角。

據史書所記，早在東漢時，交趾七郡（包括越南北部及中南部）貢獻給朝廷的物品，均先泛海至泉州所屬的東冶，然後轉運入京。三國時，吳曾從建安海道經福建出擊交趾；而孫權遣使通夷洲，亦與當時福建一帶的海外交通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佛教高僧真諦前來翻經

六朝時泉州港興起的一個重要證明，是高僧真諦航行來泉翻經。泉州民眾向來有濃烈的宗教熱誠，除道教白雲觀修於西晉初年外，太康九年（288年）又建立了佛教的延福寺，地在今泉州西面的九日山下，於是就迎來了天竺高僧拘那羅陀（Kulanatha），又名真諦（Paramartha）。真諦是著名的翻譯家，與鳩摩羅什及後來的玄奘、義淨齊名。他應梁武帝之請，於中大同元年（546年）抵華，周遊各地。據《續高僧傳》記載，真諦曾於陳永定二年（558年），抵達晉安郡（治所在今福州），由此而往南海。後來又從江南一帶，泛舶至梁安郡，“（天嘉）三年（562年）九月，發自梁安，泛舶西引，業風賦命，飄還廣州”。

章巽先生《真諦傳中之梁安郡》一文指出，梁安郡為梁朝所置，位於晉安與南海之間，其郡治故址在泉州西北十里的豐州。據《南安縣志》稱，今豐州附近的九日山有翻經石，“天竺高僧拘那羅陀泛海來中國，從泉州上岸，掛錫九日山延福寺時，在此石將梵文佛經進行翻譯，予以傳播”（參見莊為璣《古刺桐港》第101頁）。由此可見，當時泉州已成為福建一帶重要的出口門戶。

唐代回教賢人蒞泉播教

到了唐代，泉州進一步成為國際知名的海外交通名港，故《泉南雜志》云“唐設泉州…參軍四人，掌出使導贊”。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盛代，景教、回教、明教均於彼時始傳中國，而泉州則存有回教入唐的史跡可尋。

今泉州東郊靈山南麓有一回教“聖墓”。據何喬遠《閩書》云，該墓為唐初來泉傳教的穆罕默德門徒三賢、四賢的葬所。同時來華的尚有一賢、二賢，分別傳教於廣州、揚州。雖然對聖墓始建年代爭論甚大，但從泉州唐代蕃客往來之頻密，仍不能排除當時當地回教盛傳之史事。

回教聖墓四圍古木參天，怪石嶙峋。其中有一天然巨石，上可坐十餘人，風吹石動，但始終不墮，俗稱“風動石”。此一天然勝景正與聖墓交相輝映，成為古代泉州海外交通最佳之目擊者。

宋代設市舶司以招徠蕃商

宋代是中國海外貿易的興盛時期，也是泉州莫立世界最大港口地位的轉捩點。宋代謝履《泉南歌》有云：“泉州人稠山谷瘠，雖欲就耕無地闢。州南有海浩無窮，每歲造舟通異域”，《宋史·杜純傳》也提到“泉有蕃舶之饒，雜貨山積”。此等記載都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、貿易盛況之真實寫照。

隨著泉州海外貿易之日趨重要，北宋王朝遂決定於此設立市舶司，據《宋會要》載“哲宗元祐二年(1087年)十月六日，詔泉州增置市舶”，這表明泉州已和廣州、明州並駕齊驅，成為當時對外貿易的三大港口。

宋代市舶司職責，除掌管蕃貨、海舶、徵榷、貿易之事外，尚有“來遠人、通遠物”，故蕃使、蕃商絡繹來泉。宋代蕃商大多住在泉州城南瀕晉江之處，包括印度人、波斯人及阿拉伯人，其中不乏貲累鉅萬的富商大賈。北宋朝廷不僅專闢“蕃坊”，以供外商居住，而且設立“蕃學”，以培養其子女。許多蕃商往往與當地居民通婚，今丁、蒲等姓多為他們的後裔。不少蕃客死於泉州，並葬於其地，宋人林之奇曾撰《泉州東坂葬蕃商記》，專載此事，近來又發現了許多“蕃客墓”碑，是為重要的歷史見證。

泉舶泛於南、北、東洋

泉州港在宋代扶搖直上的另一明證，是當時的一些著作以該港為本位而劃分南洋、北洋、東洋，後來在泉州後渚港又發掘出宋代的遠洋海舶。據擔任過泉州知州的真德秀所記，“永寧寨……其地闢臨大海，直望東洋，一日一夜可至澎湖”，“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，正闢大海，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”。所謂北洋指湄州灣以北的海域，南洋指今廈門港以南的海域，而東洋正是今台灣海峽一帶早期的明確稱呼。關於南、北、東洋，《真文忠公文集》尚有其他記敘，茲不贅述。

泉州一帶既然早有大洋之記敘，則其造船、航海之水平必有可觀之處。果然，在1974年於後渚港出土了一艘宋末的木船，內載乳香、龍涎香等各種香藥四千七百多斤，此即古代著名的航行於絲瓷之路上的“泉舶”，或又稱“香舶”。

此外，泉州尚保留許多宋代遠洋航海之史跡。如南門天后路在

南宋曾建有聖妃宮(後稱天后宮)，乃紀念海神天后，即莆田湄州女子林默娘(又叫媽祖)的。史書上曾稱其為“福建海神”或“泉州海神”，今已成為東南亞沿海居民普遍祭祀、家喻戶曉的航海女神。另泉州西郊九日山上，存有歷年航海季節祈風的摩崖刻石，其中宋代的有四十八方。這說明當時已善於利用季風(即信風)而航海，故宋代泉州知府王十朋詩云“北風航海南風回”。

宋元絲瓷之路的起點

在南宋時，泉州由於接近首都臨安(今杭州)，加上港口優良，便自然而然地成為海外交通、貿易的“絲瓷之路”的起點。據宋人吳自牧《夢梁錄》記，“若欲船泛外國買賣，則是泉州便可出洋”，“若有出洋，則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，便可放洋過海，泛往外國也”。宋太宗的八世孫趙汝适更一度提舉泉州市舶，撰下《諸蕃志》一書，廣記泉州與外國交通貿易的盛況。當時泉州與三十多個國家、地區均有貿易往來。船舶所至，北抵高麗、日本，南達麻逸(在菲律賓)、爪哇，西到大食諸國，其範圍之廣袤蔚為壯觀。

如果說泉州在兩宋之際還與廣州、明州並駕齊驅，那麼到了宋末元初，泉州已逐漸凌駕於其他海港，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。元人吳澄曾記曰：“泉，七閩之都會也。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，殊方異域富商鉅賈之所窟宅，號為天下最”。泉州的回教富商蒲壽庚家族，在宋元之際曾壟斷了蕃船之利，富貴冠於一時。元代史弼等之出征爪哇，也是從泉州後渚港啟行的，足見泉州乃有元一代海外交通之主要門戶。

馬可波羅、巴圖塔盛讚世界大港

從元代外國人的中國遊記來看，泉州港的世界大港地位更是昭然若揭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、鄂多立克及摩洛哥人伊本·巴圖塔是元代西方的三大旅行家，而他們全都到過泉州，並均在其遊記中保留了

有關泉州(即Zaitun)的珍貴記錄。

《馬可波羅行紀》說：“所有印度船舶運載的香料及其他貴重貨物，咸集宏大繁華的Zaitun城。……余敢斷言，如有一艘船運胡椒到亞歷山大港(Alexandria)以供應基督教諸國，則同時必有百艘船運來Zaitun港。Zaitun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港口之一，這裏貨物堆積如山，幾乎難以想像”。《伊本·巴圖塔遊記》則提到，“Zaitun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，甚至是最大的港口。我目睹港內有大船百艘，小船多得不可勝數”。

關於Zaitun的今地，中外專家均認為應指泉州，唯其譯名所自則有不同說法。現在大多認為Zaitun是泉州古名“刺桐”的對音，也有的認為是“晉江”一詞之訛轉，或認為指阿拉伯油果樹Zaytun(或譯齊墩、梓橄)。不論如何，該名之指今泉州則無疑義。

泉州不愧為世界宗教博物館

泉州在唐宋元時期海外交通之繁盛，使其同時成為世界諸多宗教薈萃之所。以儒、道、佛而言，泉州有泮宮之孔廟，有道教之太上老君岩、真武廟、城隍廟、天后宮、花橋宮，又被稱為“泉南佛國”。開元、承天、崇福、南少林諸寺是泉州著名的佛教古跡。開元寺不但有佛教的雕像與殿堂，而且有古埃及神話、印度婆羅門教神話的雕刻，乃至古希臘哥林多式的石柱，寺內的東、西二塔建於宋代，通體由花崗石構成，其宏偉、精密、典雅令人歎為觀止。

隨著大食蕃商的麇集，泉州自然成為回教之勝地。著名的塗門街清淨寺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(約1009-1010年)，又稱聖友寺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回教禮拜寺之一。據載元代泉州的回教禮拜寺就有六七所之多，全國無出其右。泉州還有印度教、基督教的遺跡，據載元代天主教方濟各會修士安德烈·佩魯賈等三人曾至泉州播教並建天主教堂，被稱為“泉州三主教”，當地至今仍保存許多基督教的十字碑及

婆羅門教的碑刻。甚至連明教(摩尼教)、猶太教都可在泉州尋找到遺址或遺物，如華表山草庵的摩尼教寺，就是全國現在唯一的明教古寺廟。

總之，幾乎中國乃至世界流行過的諸大宗教，都可在泉州覓得其流傳之蹤影，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泉州實在是一座世界宗教的博物館。

明來遠驛與鄭和行香碑

到了明初，泉州在海外交通方面，仍保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它與廣州、明州是全國三個設有市舶司的港口，永樂三年(1405年)明廷於此設立了“來遠驛”，專門招徠外使、蕃客。

偉大航海家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，在出發前曾於永樂十五年(1417年)五月於泉州回教先賢塚行香，並刻石為記。“鄭和行香碑”就樹立在回教墓迴廊右側，碑云“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，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，望聖靈庇祐。鎮撫蒲和日記立”，此亦泉州海外交通史上值得一書之盛事。

明代以後，泉州作為對外港口之作用日益式微，但它在海外交通史上卻永遠佔有一席光輝地位。特別是大量歷史古跡與文物的保存、發現，使“泉州學”成為中外學者深感興趣的研究對象。除了上述中外交通、宗教遺跡外，筍江、順濟、洛陽、安平等四大名橋，六勝、姑嫂等作為古代重要航標的名塔，其建造技術之巧奪天工使人讚歎不已，令遊客大發思古之幽情。

古港盛衰與海外移民

撫今追昔，我們既為泉州海外交通史之充實豐富而驚歎，同時亦為明清以降泉州港之衰落而惋惜。泉州之由盛入衰是個複雜的問題，其原因由多方面構成，諸如戰爭之破壞、國都之北遷、朝廷之海

禁等；但一個重大的因素是外港海灣之日益淤塞，使漳州、廈門先後取代了泉州昔日的地位。

千百年來，泉州、晉江一帶之居民多恃海外貿易為生，一旦遇到海禁或閉關，自是民窮財盡、城敗港衰。但是禁者自禁，沿海居民往往衝破各種禁令而繼續走向海洋，或導致走私活動猖獗，或出現海外移民熱潮。經過數世紀的歷程，泉州一帶的居民許多已向外輻射，成為東南亞乃至全球的華僑或外籍華裔，其足跡遍於全球，至今仍方興未艾。

回顧泉州在絲瓷之路上的歷史地位，總結泉州古今海外交通、貿易的歷史經驗，加強對“泉州學”的研究，對加強沿海地區的建設及中外交流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，我們應為此而不懈努力。

（載新加坡《源》第24期，“海上絲綢之路特輯”，1993年12月）